

会计稳健性运行机制研究

谢志华¹, 杨克智²

(1. 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 100048; 2. 中央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会计稳健性作为一种治理机制, 其运行机制是内外部治理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基于投资者保护的视角, 从制度环境、公司治理与公司特质三个方面对国内外会计稳健性实证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 单纯强调会计准则中会计稳健性的变革并不能改善会计信息的质量, 会计稳健性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还需要配套的法律和执行机制。因此, 我国会计准则在与国际趋同的过程中, 对会计稳健性的运用要充分考虑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 改革国内相关的制度, 如法律实施环境、公司治理等。

[关键词] 制度环境; 会计稳健性; 投资者保护; 公司治理; 会计准则

[中图分类号] F23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33(2011)02-0009-08

一、引言

会计稳健性主要表现为不高估资产和收益、不低估负债和费用。会计稳健性是会计确认与计量的重要原则, 对会计实务的影响至少已经有 500 年的历史, 在最近 30 年间会计稳健性不断增强^[1]。会计稳健性在会计实务界影响深远, 但学术界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重视会计稳健性的研究。Watts(沃特斯)最早建议对稳健性进行系统研究。他认为会计稳健性来自会计的契约作用, 并同时受到监管及法律的影响^[2]。长期以来, 尽管会计上奉行稳健性原则, 但通常所说的稳健性原则在经验研究中很难量化, 这大大制约了对稳健性原则实施效果的评价。Basu(巴苏)将稳健性理解为会计报告对“坏消息”的确认比“好消息”更及时^[1]。也就是说, 对于“好消息”必须在事项基本确定发生时才能确认, 而对于“坏消息”则应尽早确认损失。在此基础上, Basu(巴苏)提出了基于盈余/股票报酬关系的会计稳健性测度模型(以下简称巴苏模型)。该模型为测定会计稳健性的“度”找到了突破口, 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研究者对稳健性研究的热情, 催生了大量关于稳健性的研究文献^[3-5]。虽然在已有的会计稳健性研究文献中, 巴苏模型得到了广泛应用, 但巴苏模型在设定和内生性方面也饱受争议^[6]。在会计稳健性计量模型的后续研究中, Beaver(比弗)和 Ryan(瑞安)通过权益的市场价值和账面价值的比率来衡量稳健性, 因为稳健会计会导致资产的低估, 从而导致该比率变小^[7]。尽管市价/账面净资产(市净率)可以作为净资产低估的直接测度, 但市净率的计算由每股市价和每股净资产共同决定, 因此当股价存在泡沫时, 会计稳健性会存在系统性的计量误差。Givoly(吉奥理)和 Hayn(海恩)认为会计稳健性会导致应计项目的净累计额持续为负, 因此可以用各期累计应计利润的符号和大小作为稳健性的测度^[8]。Ball(鲍尔)和 Shivakumar(希弗库马)认为经济损失更可能在发生时以及及时的方式确认, 而经济利得更可能在其实现时以递延的方式确认。这种不对称构成了应计利润与同期现

[收稿日期] 2010-09-28

[基金项目] 北京市高等学校人才强教深化计划“高层次人才资助计划”项目(PHR20100512)

[作者简介] 谢志华(1959—), 男, 湖南益阳人,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会计、审计理论研究; 杨克智(1983—), 男, 江西樟树人, 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事资本市场财务和会计研究。

金流量呈正的但不对称相关关系。根据这个原理,他们构造了应计/现金流关系模型来度量稳健性^[9]。Penman(彭曼)和 Zhang(张)根据企业的存货、研发费用和广告准备金构建了计量稳健性分值的模型^[10]。Khan(卡恩)和 Watts(沃特斯)从一系列企业特性中选择公司规模、市值与账面价值比率和负债率作为估计稳健性指数的指标,设计出度量公司/年稳健性程度的指标——稳健性指数^[11]。

自从 Watts(沃特斯)系统性地提出会计稳健性需求的契约、诉讼、监管和税收四种因素以来^[12-13],学者们利用会计稳健性计量模型,从不同的方面对这四个假说进行验证,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如: Bushman(布什曼)和 Piotroski(皮奥特罗斯基)研究了国家的法律制度与政治制度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14]。毛新述和戴德明研究了我国会计制度变革对稳健性的影响^[15]。Paek(佩克)、Chen(切恩)和 Sami(萨米)研究了盈余水平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16]。朱茶芬和李志文利用巴苏模型研究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区别^[17]。会计稳健性是一种约束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代理成本的一种治理机制。因此,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来对会计稳健性的内涵进行归纳和演绎,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会计稳健的本质及其运行机制。会计稳健性与国家制度因素和公司特质是密切相关的,正如 La Potal(拉波特尔)、Lopez-de-Silanes(洛佩茨·德·西拉斯)、Shleifer(施雷夫)和 Vishny(维什尼)(以下简称 LLSV)将投资者保护归结为法律、司法效率、会计准则以及公司治理等的综合作用。我们将对会计稳健性研究框架进行拓展,从制度环境、公司治理与公司特质三个方面对会计稳健性的运行机制进行论述,为理解和研究会计稳健性运行机制提供一个完整的框架。

本文其他部分的内容如下:第二部分是会计稳健性运行机制的一个拓展框架,主要从制度环境、公司治理和公司特质三个层次构建会计稳健性形成和运行机制。第三、四、五部分分别从上述三个层次展开论述,第六部分是小结。

二、会计稳健性与投资者保护:一个扩展的框架

大量文献认为,稳健的财务报告是高质量的,或者说高质量的财务报告应当是稳健的,稳健的会计信息有助于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而发挥投资者保护作用^[5,9]。会计计量方面的内在局限性和财务报告的发展,一方面使得真实反映和报告企业交易和事项的经济实质离不开管理层判断;另一方面,管理层拥有的这种判断及其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又为其操纵财务报告从而最大化自身利益创造了条件。由于现有的各种制度安排,如业绩考核、薪酬契约、债务契约、证券发行和监管体系,主要依赖以盈余为基础的业绩指标,这就为管理者高估盈余提供了激励。即使缺少基于会计信息的正式契约,管理者不对称的损失函数使其也有动机在公司任期内使用私人信息高估财务业绩和股票价格,以将投资者的财富转移给自己^[18]。稳健性原则要求及时地确认损失,不允许盈余平滑和“洗大澡”,更不允许采用激进的会计政策来增加盈余,因此它作为一种财务报告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管理层判断的滥用以及高估盈余的行为,从而改善财务报告质量。研究表明,稳健性原则的运用通过降低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限制了管理层对未实现利得的确认,减少了财务报告的偏差,提高了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从而降低了公司的代理成本,增加了公司的价值,保护了公司投资者的权益^[12,18]。

会计稳健性是投资者保护的内在要求,是最重要的会计属性之一。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2号》中要求在财务报告中,如果未来收入或支付的两个估计金额有同等的可能性,就使用较为不乐观的估计数。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认为稳健性是指“在存在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在判断中加入一定程度的谨慎,从而不多计资产或收益,也不少计负债或费用”。我国2006年的《企业会计准则》将会计稳健性作为一项重要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明确将稳健性界定为“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然而,稳健性虽然是会计政策选择的结果,但会计稳健性实施的效果受到制度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包括法律、司法环境和公司治理等方面。Ball(鲍尔)、Kothari(科塞里)和 Robin(罗宾)的研究表明普通法国家和成文法国

家会计稳健性方面存在区别^[3]。这说明国家的制度环境会系统性地影响会计稳健性的偏好和选择。而 García Lara(加西亚·拉雷)等以及 Chi(齐)等研究了公司治理与会计稳健性有关系,无论是互补观还是替代观都说明公司治理对会计稳健性有显著影响^[19-20]。因此,会计稳健性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其运行机制是内外部治理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单纯转变会计准则并不能改善会计信息的质量,除非存在相配套的强有力的法律和执行机制。笔者认为,会计稳健性作为一种投资者保护机制,与制度环境、公司治理、企业特质密切相关,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会计稳健性契约、诉讼、监管和税收四大解释(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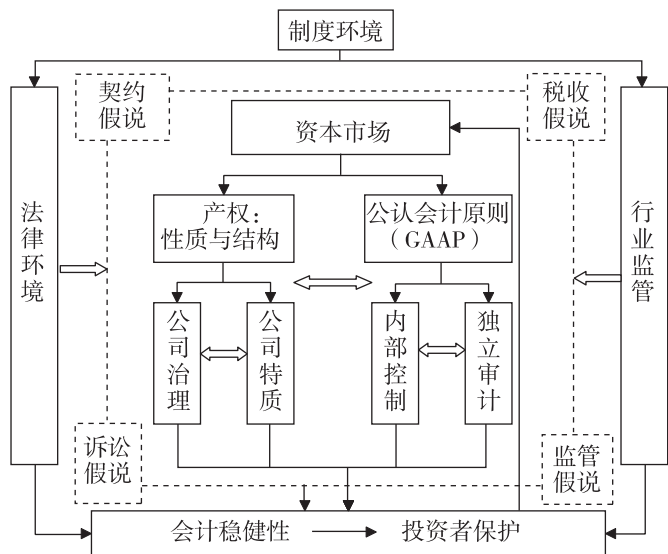


图1 会计稳健性运行机制

下面我们将围绕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会计稳健性以及会计稳健性如何影响企业的运行展开讨论。

三、制度环境与会计稳健性

制度因素是影响会计稳健性的重要因素,早期关于会计稳健性的研究文献主要是从制度方面展开的^[1]。借鉴 LLSV 研究投资者保护的框架,我们将制度环境与会计稳健性运行机制分为法律与司法、会计准则以及行业监管三个方面。

(一) 法律与司法效率

以 LLSV 为代表的投资者保护法律论为投资者保护理论的主流。他们的主要观点是法律体系在投资者保护方面至关重要,是决定投资者保护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在会计稳健性法律层面, Ball(鲍尔)、Kothari(科塞里)和 Robin(罗宾)用 1985 年—1995 年的数据比较普通法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和成文法国家(法国、德国和日本)会计稳健性方面的区别。他们认为普通法国家更多地依赖公开披露和契约来解决财务报表编制者和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成文法国家中各方的信息不对称主要通过内部私人沟通而不是使用外部契约予以解决。因此,在契约中使用公开会计报表数字的特点将导致普通法国家的盈余较成文法国家的盈余更稳健。经验数据支持了他们的观点^[3]。有的研究表明,同样是普通法的国家(地区),稳健性也存在差异。Ball(鲍尔)、Robin(罗宾)和 Wu(吴)利用亚洲四个具有普通法传统的国家和地区(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香港)1984 年—1996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会计稳健性与成文法国家的会计稳健性更相似^[5]。Bushman(布什曼)和 Piotroski(彼得罗斯基)研究了国家的法律制度与政治制度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他们发现在控制法律起源的影响后,司法体系效率高的国家,其盈余更为及时地反映坏消息^[14]。Raonic(拉奥尼克)、McLeay(麦克利)和 Asimakopoulos(阿思马克普洛斯)研究了不同国家信息披露制度、司法执行力度和资本市场重要程度对稳健性的影响,发现会计盈余对坏消息的敏感程度会随着司法执行力度的加强而得到提高^[21]。朱松和夏冬林采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制度环境指数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宏观指标进行研究,发现法制建设越好,市场化进程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少,地区经济发展越好,财务报告的稳健性就越强^[22]。

(二) 会计准则变迁与会计稳健性

会计稳健性是最重要的会计属性之一,会计准则的变迁背景为我们纵向研究会计稳健性与会计

准则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契机。Basu(巴苏)发现,美国在1967年之前不存在支持稳健性的经验证据,而在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1973年成立之后会计稳健性增加了^[1]。Holthausen(霍尔托森)和Watts(沃特斯)运用1927年—1993年美国公司的数据,按照准则制定、监管和诉讼环境,将其分为1927年—1941年(准则制定之前,低法律诉讼)、1942年—1946年(价格控制,准则制定,低法律诉讼)、1947年—1950年(准则制定,低法律诉讼)、1951年—1953年(价格控制,准则制定,低法律诉讼)、1954年—1966年(准则制定,低法律诉讼)、1967年—1975年(准则制定,高法律诉讼)、1976年—1982年(准则制定,诉讼)以及1983年—1993年(准则制定,高法律诉讼)。他们的研究表明,自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成立之后,会计稳健性程度有实质性的增强:会计稳健性系数从1976年以前的小于0.10,增加到1976年—1982年间的0.16,然后再增加到1983年—1993年间的0.43^[4]。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国有企业改革、证券市场发展和国际接轨的共同推动下,我国会计制度的改革逐渐深入。曲晓辉和邱月华以1995年—2004年深沪两市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制度》的实施是否显著提高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盈余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的实施并未实质性提高1998年—2000年间会计盈余的稳健性水平,而国际通行的《企业会计制度》的实施则显著提升了2001年—2004年间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盈余的稳健性^[23]。迟旭升和洪庆彬以2005年—2007年深市A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在2006年我国出台新会计准则的背景下,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稳健性水平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是存在稳健性特征的。根据研究数据,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稳健性有所提升,但提升的幅度相对有限^[24]。毛新述和戴德明以1994年—2007年我国会计制度改革为研究背景,发现上市公司的盈余稳健性同会计制度中稳健性原则的运用程度紧密相关^[15]。从上面的研究可以看出,尽管我国新会计准则中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但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会计准则稳健性的属性。这也恰恰说明会计准则不能完全解释会计稳健性,至少还存在其他影响会计稳健性的机制,如法律、司法效率及公司治理等。

(三) 制度安排与行业监管

监管是会计稳健性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对准则制定机构和监管机构来讲,它们会因为制定不完善的准则而受到批评和指责。为了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准则制定机构会从准则制定角度要求会计准则更加稳健^[14]。监管机构也会在制度执行上更加严格,以减轻舆论压力。Holthausen(霍尔托森)和Watts(沃特斯)分析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他们发现在证券交易委员会产生之前,资产价值可以调增到市场价值,并且许多调升都是针对房地产、厂房和设备的。20世纪30年代后期,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对调增行为进行限制和监管,这导致对固定资产进行从新估值并调增的会计实务到1940年已经“不复存在”。从40年代到70年代,证券交易委员会有效地禁止了资产在财务报表中的调增估值^[4]。Lobo(洛博)和Zhou(周)检验了《萨班斯法案》(SOX)颁布前后会计稳健性的差别,研究发现在《萨班斯法案》颁布后,稳健性水平显著提高了^[25]。

在我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IPO)、配股增发(SEO)、扭亏摘帽以及对高管人员的业绩考评均是直接以盈余为基础,这些制度安排引发了上市公司大规模的盈余操纵现象。由此可以看出,以盈余为基础的监管和评价制度是我国会计制度中稳健性原则强化的外在制度原因,而根本原因在于稳健性原则的运用作为一种财务报告机制可以改善公司的盈余质量,并强化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26]。经验研究也表明,自1998年起,由于《证券法》的颁布实施,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稳健程度显著增强^[27]。

四、公司治理与会计稳健性:互补关系还是替代关系?

公司治理是一系列确保公司资产有效利用和保障投资者获得相应投资回报的机制。会计稳健性

是一种投资者保护机制,关于它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理论界存在两种观点:一是替代观,二是互补观。

(一) 公司治理与会计稳健性的替代观

该观点主要是从会计稳健性的需求角度来研究的,它认为公司治理可以对投资者进行保护,无需依靠稳健性来减少代理成本。会计稳健性对损失和收益确认的不同标准,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抑制管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契约中对会计稳健性的规定使得股东/债权人能够对管理人员进行更充分的监督。会计稳健性是一种治理机制,从成本的角度考虑,公司治理机制与会计稳健性具有替代性。LaFond(拉方德)和 Roychowdhury(罗伊乔德赫瑞)的经验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与管理人员持股的比率呈负相关关系。他们认为低的管理层持股比率意味着存在更严重的代理问题,因此股东/债权人对会计稳健性具有更高的需求^[28]。反过来,高的管理层持股比率也即公司治理更完善的公司,其股东/债权人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也越低。LaFond(拉方德)和 Watts(沃特斯)提供了会计稳健性与信息不对称程度之间的经验证据,认为会计稳健性能够降低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代表不同的信息环境,弱的公司治理环境产生更高的会计稳健性需求^[18]。Chi(齐)、Liu(刘)和 Wang(王)的研究表明在缓解代理问题上,会计稳健性与其他治理机制的替代机制,机构投资者比率越高,会计稳健性的需求越低。总经理同时是董事会成员时,会计稳健性的需求更大^[20]。以上研究从正反两个方面验证了公司治理与会计稳健性的替代关系。

(二) 公司治理与会计稳健性的互补观

该观点主要是从会计稳健性的供给角度来研究的,它认为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更倾向于提供稳健性的会计信息。Beekes(比克斯)等发现董事会中拥有更高比率的外部董事的英国上市公司在确认坏消息时更加及时^[29]。Ahmed(阿梅德)和 Duellman(迪尤尔曼)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与内部董事比率负相关,与外部董事持股比例正相关。会计稳健性能够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降低自负成本,为董事会履行其职能、监督管理者的行为提供有利的工具^[30]。García Lara(加西亚·拉雷)等认为公司治理越完善,会计稳健程度就越高。他们指出公司治理机制与会计稳健性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稳健的会计信息能够减少代理成本,降低董事、审计师以及管理人员的诉讼风险等,所以高效的公司治理机制需要稳健的会计信息,并且在会计稳健性执行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

(三) 公司治理与会计稳健性的博弈观:我们的观点

会计稳健性是委托人与代理人相互博弈的结果。从委托人需求观点看,如果公司治理很完善,那么其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就少。这是因为,如果公司治理很完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就比较弱,委托人对代理人进行充分监督,额外的会计稳健性增加了信息成本。相反,如果公司治理比较弱,会计稳健性的需求就会增加,从而减少代理成本。从代理人的供给方面来看,公司治理好的公司,代理人受到监督,其面临的诉讼和监管风险也大,所以代理人愿意提供稳健的会计信息。总的来看,公司治理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是委托人与代理人博弈的结果,替代观和互补观都是博弈的均衡结果之一。同时,博弈受到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5]。当前,由于我国外部治理机制的弱化,公司治理与会计稳健性表现出显著的互补关系。例如,朱茶芬和李志文利用沪深2001年—2004年A股上市公司的大样本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国家控股上市公司对应着更低的会计稳健性。有的研究还表明,内部人控制、债务软约束和政府干预等三大治理弱化是抑制国有公司披露意愿、降低其盈余质量的制度根源^[17]。修宗峰研究我国上市公司两个股权结构变量(即股权集中度与股权制衡度)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少数大股东可能通过及时确认“好消息”以及滞后确认“坏消息”的方式来掩盖对中小股东的“掏空”行为,使会计稳健性较低,而股权制衡度较高的上市公司具有较高的稳健性,这有利于抑制少数大股东对会计盈余信息的操纵从而保护中小投资者财富不受侵占^[31]。

五、企业特质与会计稳健性

企业的规模、行业、盈余水平以及成长性等不同,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也不相同,对会计稳健性

的需求和供给程度也就不相同。代理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内生性的问题,所以公司特质是影响会计稳健性的决定因素。

(一) 规模

大公司比小公司面临更大的政治成本,规模较大的公司可能会更成熟,有更丰富的信息环境,能够降低预期收益整体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性^[11]。大企业有更多、更复杂的操作环节,可能会增加信息不对称,但经验研究表明大型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要低于小企业^[26]。Khan(卡恩)和Watts(沃特斯)指出,一方面契约对大公司的会计稳健性需求比较低;另一方面,税收和诉讼对大公司的会计稳健性的需求要更高一些^[11]。

(二) 盈余水平

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盈余的规模、结构和波动是否会对会计稳健性产生影响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从理论上说,盈余与会计政策的选择应该是独立的,也可以称之为“分离原则”。但是,由于企业的盈余往往是契约制定和考核的标的物,盈余的确认、计量等就与管理人员的动机密切相关。从盈余管理的角度看,管理者具有利用会计稳健性实现亏损公司“洗大澡”的目的^[32]。陈旭东和黄登仕运用2001年—2003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并非独立于当期的盈余水平,盈余水平高的公司会增加对好消息的确认、降低对坏消息的确认,从而会计稳健性较低;盈余水平低的公司会增加对坏消息的确认、降低对好消息的确认,从而会计稳健性较高^[33]。从盈余信息相关性角度看,会计稳健性损害了同期会计收益与费用的配比关系,导致了更低的盈余持续性,经验研究也表明会计稳健性与盈余的持续性呈显著负相关关系^[16]。

(三) 成长性

成长性高的公司股票回报的波动性更大,因而面临更高的诉讼风险,稳健性更高。同时,成长性越高的公司,其融资需求越大,股东和债权人对稳健性的有效需求也越大。经验研究也发现成长性与会计稳健性成正相关关系^[34]。周晓苏和杨忠海采用2004年—2006年中国A股市场上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成长较快的上市公司有更高的财务报告稳健性^[35]。

(四) 行业

不同行业的会计处理方法和会计选择存在差异,会计稳健性与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风险水平等正相关。Field(菲尔德)等研究发现,高科技公司比其他公司拥有更高的诉讼风险,不确定性也更高,所以高科技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更高^[36]。陈旭东和黄登仕选取1993年—2003年所有在上海和深圳证交所交易的A股公司进行研究后发现,中国的会计稳健性具有行业特征,制造业比较明显^[37]。

(五) 企业生命周期

当前,会计稳健性研究主要是基于短期的结果,当将结果扩展到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多期动态的结果与单期的结果是不同的。企业的生命周期不同,则不确定程度不一样,委托代理成本在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也存在巨大的差异,这导致企业生命周期中对会计稳健性需求程度也不一样。目前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文献还比较少,陈旭东和黄登仕采用中国上市公司1998年—2005年的数据,运用基于整个现金流量的信息组合构建企业生命周期的代理变量。他们发现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中国的上市公司应计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的变化呈现规律性变化,会计稳健性的差异受到企业基本面的影响也呈现规律性变化。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初期,企业的无条件稳健性强,条件稳健性弱。与此相反,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末期,企业的条件稳健性强,无条件稳健性弱。条件稳健性和无条件稳健性是相互替代的。总体而言,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在整个生命周期大致呈现U型分布^[38]。

六、小结

实务中会计稳健性虽然有500多年的历史,但真正的学术研究还只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而且会

计稳健性也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会计原则,甚至许多资本市场规制者、准则制定者和实务工作者还经常批评并试图放弃会计稳健性^[2]。会计稳健性在美国的长期存在(在最近30年还有所加强),说明了会计稳健性在投资者保护方面的有效性。会计稳健性与投资者保护是制度、公司治理和公司特质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有从整体上把握会计稳健性的运行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在投资者保护方面的作用。

我国会计准则在与国际趋同的过程中,对会计稳健性的运用要充分考虑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因此改革国内相关的制度,如公司治理、法律实施环境等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学者对会计稳健性的研究主要是借鉴国外学者的模型,采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会计稳健性与公司治理、盈余管理等变量进行相关性的研究,缺乏对会计稳健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深入研究。制度环境对会计稳健性的作用机制、经济后果等方面是将来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Basu S. The conservatism principle and the asymmetric timeliness of earning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1997, 24 (1): 23 - 37.
- [2] Watts R L. A proposal for research on conservatism[D].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1993.
- [3] Ball R, Kothari S P, Robin A.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factors on properties of accounting earning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2000, 29 (1): 41 - 51.
- [4] Holthausen R W, Watts R L. The relevance of value-relevance literature for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etting[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2001, 31(1/3): 53 - 75.
- [5] Ball R, Robin A, Wu J. Incentives versus standards: properties of accounting income in four East Asian countrie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2003, 36 (1/3): 235 - 270.
- [6] Dietrich R, Muller K A, Riedl E J. Using stock returns to determine bad versus good news to examine the conservatism of accounting earnings[R].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and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2003.
- [7] Beaver W H, Ryan S G. Biases and lags in book value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ability of the book-to-market ratio to predict book return on equit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0, 38 (1): 127 - 148.
- [8] Givoly D, Hayn C. The changing time-series properties of earnings, cash flows and accruals: has financial accounting become more conservative?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2000, 29 (3): 287 - 320.
- [9] Ball R, Shivakumar L. Earnings quality in UK private firms: comparative loss recognition timelines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2005, 39 (1): 83 - 128.
- [10] Penman S, Zhang X.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the quality of earnings and stock return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2, 77 (2): 237 - 264 .
- [11] Khan M, Watts R L. Estimation and validation of a firm-year measure of conservatism[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2009, 48 (2/3): 132 - 150.
- [12] Watts R L. Conservatism in accounting Part I: explanations and implications[J]. *Accounting Horizons*, 2003, 17 (3): 207 - 221.
- [13] Watts R L. Conservatism in accounting Part II: evidence and research opportunities[J]. *Accounting Horizons*, 2003, 17 (4): 287 - 301.
- [14] Bushman R, Piotroski J. Financial reporting incentives for conservative accounting: the influence of leg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2006, 42(1): 107 - 148.
- [15] 毛新述,戴德明. 会计制度改革、盈余稳健性与盈余管理[J]. *会计研究*, 2009(12): 38 - 46.

- [16] Paek W D, Chen L H, Sami H.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earnings persistence and pricing multiples on earnings [R]. Available at SSRN Working Paper, 2007.
- [17] 朱茶芬,李志文. 国家控股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J]. 会计研究,2008(5):38-45.
- [18] LaFond R, Watts R L. The information role of conservatism[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8,83(2): 443-478.
- [19] García-Lara J M, García Osma B, Penalva F.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09,14(1):161-201.
- [20] Chi W, Liu C, Wang T. What affects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 corporate governance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 Economics, 2009,5(1):47-59.
- [21] Raonic I, McLeay S I, Asimakopoulos. The timeliness of income recognition by European companies: an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and market complexity[J].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2004,31(1/2):115-148.
- [22] 朱松,夏冬林. 制度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与会计稳健性[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6):57-63.
- [23] 曲晓辉,邱月华. 强制性制度变迁与盈余稳健性——来自沪深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 2007(7):20-28.
- [24] 迟旭升,洪庆彬. 新会计准则下会计盈余稳健性研究——来自深市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9(2):22-27.
- [25] Lobo G L, Zhou J. Did conservatism in financial reporting increase after the Sarbanes-Oxley Act[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6,20(1):57-73.
- [26] 毛新述,戴德明. 会计制度变迁与盈余稳健性:一项理论分析[J]. 会计研究,2008(9):26-32.
- [27] 钱春海. 会计改革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稳健性了吗? [J]. 财贸研究,2009(2):126-133.
- [28] LaFond R, Roychowdhury S. Managerial ownership an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8,46(1): 101-135.
- [29] Beekes W, Pope P, Young S. The link between earnings timeliness, earnings conservatism and board composition: evidence from the UK[J].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4,12(1):47-59.
- [30] Ahmed A S, Duellman S.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nd board of director characteristics: an empir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2007,43(2/3):411-437.
- [31] 修宗峰. 股权集中、股权制衡与会计稳健性[J]. 证券市场导报,2008(3):40-48.
- [32] 陈旭东,黄登仕. 会计盈余水平与会计稳健性——基于分量回归的探索分析[J]. 管理科学,2006(8):52-61.
- [33] 李远鹏,李若山. 是会计盈余稳健性,还是利润操纵?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5(3):41-56.
- [34] Ahmed A S, Billings B K, Morton R M, et al. The role of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in mitigating bondholder-shareholder conflicts over dividend policy and in reducing debt cos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2,77(4):867-890.
- [35] 周晓苏,杨忠海. 控股股东行为、特征与财务报告稳健性——中国 A 股市场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0(2):54-61.
- [36] Field L, Lowry M, Shu S. Does disclosure trigger litigation?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2005,39(3):487-507.
- [37] 陈旭东,黄登仕. 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时序演进与行业特征研究[J]. 证券市场导报, 2006(4):59-65.
- [38] 陈旭东,黄登仕. 企业生命周期、应计特征与会计稳健性[J]. 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8(10):11-33.

[责任编辑:马志娟]

(下转第 88 页)